

歷史空間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錢華

紅花：中日交流之花

紅花，學名Carthamus tinctorius，它和茜草自古以來就是紅色天然染料的代表性植物。紅花除含有紅色素之外，還含有黃色素。紅花是「紅藍花」的簡稱，也稱黃藍。紅花經過浸泡之後很容易洗出黃色素，用於被染物，唯色彩堅牢度不佳，故較無應用價值。紅花搗碎，經過水洗、發酵等過程，能將紅色素洗出，經固化後就會成為紅色染料的紅花餅，這樣方便流通和貿易。《博物誌》和《齊民要術》當中具體記載了從紅花中抽出紅色素的方法。由紅花精製而成的紅，除了作為染料之外，還可作為中藥材和化妝材料。

紅花原產地中海沿岸和埃及，經過絲綢之路傳播到中國。根據張華的《博物誌》，是張騫通西域時帶回紅花的種子，並在中原地區廣泛栽培。

「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匈奴哀歌與紅花

還有人認為紅花原產於中國西北匈奴地區的焉支山。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大敗匈奴，漢王朝收復了河西地區，匈奴不得不退到焉支山北。焉支山區是天然草場，這裡風景秀麗，物產豐富，是匈奴賴以生存的家園。據傳說，那時匈奴諸藩王的妻妾多出自這一帶，因此匈奴語稱各藩王之妻叫「閼氏」，即焉支的諧音。此外，因焉支盛產胭脂的原材料紅藍花，匈奴貴族婦女常以「閼氏」（胭脂）妝飾臉面。故匈奴於戰役中失去了焉支山寶地，不得不發出哀歌：「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所以，紅花也稱為燕支。崔豹《古今注》卷下云：「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為燕支。中國人謂之紅藍，以染粉為婦人名，謂為燕支粉。」

關於紅花是否由張騫從西域帶回，沒有定論，但並非中國原產則毫無疑問。根據《齊民要術》，乃知紅花最初栽種地可能在今冀魯豫數省市。唐代編纂的《大唐六典》、《通典》、《元和郡縣圖志》、宋代編纂的《新唐書》，記載了唐代中國領土廣泛栽培紅花的史實，如興元府（梁州，今陝西南鄭）、蜀州（今四川崇慶）、漢州（今四川德陽）、靈州（今寧夏靈武）、青州（今山東青州）等。

紅花自古便是重要的經濟作物，《齊民要術》卷5載有栽種紅藍花法。

日本紅花之榮枯盛衰

關於最早記載紅花由中國人和朝鮮人帶到日本的書籍是應神天皇時代的《播磨國風土記》。近年從奈良縣櫻井市跡發現了紅花花粉，證明三世紀中葉紅花就已經傳到日本。《古事記》和《萬葉集》中稱紅花為吳藍

或末摘花。正倉院御物鳥毛立女屏風美人、奈良藥師寺吉祥天像、法隆寺金堂壁畫菩薩像，其口紅和腮紅，皆反映上流貴族的生活文化中流行使用紅的。

進入平安時代，隨著貴族文化的發展，對紅的需求越來越增多，紅花生產地擴大。《延喜式》卷十四「縫殿寮」記載了紅花染的染色材料。另外，《延喜式》卷二十四「主計寮」中記載了全國六十八個國當中，從中國地方到關東地方有二十四個國栽種紅花，表明當時日本廣泛地區盛行栽培紅花的史實。《延喜式》中將紅花列為男子納租稅實物，說明紅粉在當時應屬高價昂貴之物品。

隨著栽培方法和紅花染色技術等的開發，紅花為華麗的平安文化增添了色彩，男子的束帶和女性的十二單衣，作為平安時代最有代表的服裝，其染色大量使用紅花染。江戶時代中期以後，因為紅花在手襪染、口紅和藥用方面的廣泛使用，紅花尤其是友禪染發展的重要因素，所以紅花對江戶服飾文化的興起發揮了重大作用，此時亦迎來了紅花的成熟期。

如化政文化期，紅化妝特色為「目紅」，即在眼睛四周塗紅再抹白粉，使其成淡紅色並有微醺模樣之表情。在文化上，顯示紅妝文化漸趨妍麗濃艷；在經濟上，高價紅顏料大量被使用，反映町人庶民階級的消費能力。與此同時，紅花主要產地最上地區生產量大幅提升，表明紅花需求之盛況。幕府擔憂化妝文化過於強勢，為鞏固主流階級文化，近世中後期不斷展開政治經濟改革措施，發佈紅花禁令或限制紅花材料用品的貿易，並科以刑罰。

日本紅花產額減退始於天保年間。其時，薩摩最早輸入中國紅花，然後又把它作為國產品運到京都，不過輸入的量極其少，沒有對日本本土紅花產生影響。進入明治時代，明治政府推行殖產興業政策，《齊民要術》亦南北朝時後魏賈思勰所撰農村養蠶業普及，茶葉生產需求增大，且茶樹栽培比紅花栽培更加獲利，農民交替種植桑樹、茶樹和紅花，紅花栽培在全國範圍內急遽減少。但這時紅花的需求量並沒有減少，為了彌補日本國內紅花生產的不足，染織業界不得不輸入中國和印度的紅花。明治二年，輸入紅花還不到十萬斤，但

明治八年輸入額卻接近四十萬斤。

一般來說，印度產的紅花指東印度和暹羅產的紅花。根據日本農務局錄事記載，明治十九年從中國輸入三萬八千多斤紅花，從東印度、暹羅輸入七千多斤紅花；明治二十年從中國輸入四萬六千多斤紅花，從東印度、暹羅輸入五千多斤紅花。為甚麼中國紅花輸入量遙遙領先？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時日本國產主要地村山郡等地紅花粗製濫造，混入殘花枝葉，甚至摻雜米粉和米糠來提高重量。當時這種傾向非常強烈，京都的紅花商人寧願依賴輸入外國紅花確保質量安全，而中國的紅花在品質和榨紅技術上都佔有明顯優勢。

明清時期紅花作為染料商品作物全國各地廣泛種植。如清代河南新鄉縣的紅花為遠近商賈所青睞，成為當地大宗出口商品。紅花是明清中日貿易重要物品之一。島田龍登曾以蘇木和紅花為例，對唐船來航線路變化與近世日本國產代替代進行深入研究。

雖然如此，中日紅花最終都未有逃脫西洋化學染料的侵入，最終走上衰亡之路。數千年來散發了光輝的紅花，經過炎熱的沙漠，穿山越嶺，又飄洋過海，它悠久的草木染傳統，仍然值得現代人去承繼。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紅花。



■紅花的傳播路線。

五欄閑話

■李恩柱

貪官的底蘊

十多年前，讀過一篇從經濟學角度探索反腐的文章。文章提到了西奧博爾德的六種反腐敗方式：一次性清洗運動，常設反腐敗機構，非政治化手段如軍管，道德建設，建設官僚隊伍，縮小腐敗行為的機會。文章認為，前三種基本無效，比如常設反腐敗機構，雖然擁有受訓的專門反腐人員，但是它最終依賴於掌權者的良好願望。它只能對付小貪官，在大官面前作用甚微。文章說，腐敗存在的基礎是政府控制的權力過大，因此第六種方式，即下放權力，走向小政府大社會，把更多事情交給「看不見的手」即市場，是解決腐敗問題的根本出路之一。



此論是耶？非耶？不諳經濟學的人無力置評，但文章在世人皆發表反腐高見之時，站在不同視角觀察人類社會，令人獲益甚多。可見學術問題非得各類觀點相切相磋，才談得上深入研究；倘視別人為異端，只有自己才全盤正確；以鄰為壑，細說起來仍是陷於妄自尊大的「天朝」思維不能自拔。學術發展須有寬鬆的環境，一是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二是不深文周納，不做無端演繹。

這些都是舊語陳言，就此打住吧。不能不令人思忖的是，文章所指出的那種怪狀：一些反腐措施「只能對付小貪官，在大官面前作用甚微」，為甚麼具有生存空間？西奧博爾德是外國人，他觀察到的現象，居然中國也存在。顯然，在人性方面，地不分南北，人不講東西，「國情」後面站着「世情」。

自古及今，權力持有者一直尋找反腐的有效手段，反腐措施也日益周全、細密。然而，仍然貪污腐敗相隨，缺乏對大貪官有效約束，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因素。何為有效？在現實中而不是在理論上，不僅能夠制伏甲，而且能制伏乙、丙、丁，即任何人不論官階高低，都必須在規則之下行使自己的權力，調整自己的言行。倘若只有小百姓、小衙役、小官員遵守遊戲規則，大官大吏卻可以視規則為無物，玩弄於股掌之上，那種規則其實是毫無約束力的，是無效的。「民主」、「監督」等等，只有在法律規則之內運行，才會發生實際作用。

晚清出使英國的郭嵩燾寫信對李鴻章說：船堅炮利是最微末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國的根本。監督之類雖不屬於物質範疇，但只借來幾個概念，而忽視其發揮效力的環境，未必不弄個豬八戒照鏡子。當社會上只有空洞概念的時候，無論這個概念多麼華麗，最終也只能淪為「國妖」、「國賊」的玩物。世人常言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即與這種原因相關。

貪官是如何長成的？不管他多麼貪，也有個從小到大的過程，由小貪官孵化而成。不論小貪大貪，他們身邊的律令條文都會很多，怎麼還能不斷腐化，無休無止呢？其實這就是缺乏法律環境造成的。比如，一個坐在台上的大官，可以指着台下的人大講特講「拒腐蝕永不沾」的道理，他自己卻不包括在內，也就是一切規則都是為別人設計的，他自己則可以任意而為。在一切規則充滿隨意性的社會，實際比無規則好不到哪裡去。素常我們以為，貪官毫無本領，只會溜鬚拍馬取悅當權者，而當權者只知斂財，毫無惡。實際上這是洩憤，是不公平導致的憤怒。荀子就曾說過，口言善，身行惡，是國妖。然而幾千年來，滿嘴「仁義道德」者仍然如魚得水，手段拙劣、陳腐的貪腐者仍然屢戰屢勝，其中原因何在？

據記載，和坤做了大學士以後，「貴位無不仰其鼻息，視之如泰山之安」，或「恃為奧援」極力攀附之。對一些官員而言，不論古今，終極目標就是做更大的官，發更大的財。攀援上和坤之後，整個統治集團有恃無恐，或索賄，或搜刮民脂民膏，或監守自盜。乾隆前期貪污案少與後期貪污案多，實際都是隨意性極強的法律結出的果子。法條不確定性，可以使果實碩大，也可以使果實僵小，一切以乾隆的好惡而定。這不是只憑個人的道德操守就能解決的問題。(識貪·之十)

文化觀察

■文：陳科科

熱點詞評

國王與囚犯

三五七時總會有些著名網站企業（如Google、Twitter、Facebook）的「面試題目」流出。當中總有些必須跳出框框的虐待腦袋問題。近來在討論區見到這一條，惹來二三百個回覆。你也可以看看懂不懂答。

話說某國有個國王，有天招來100個囚犯，然後對他們說：「你們本該全都是死人！就因為我慈悲為懷，所以給你們一次死而復生的機會。這裡，有100間獨立的囚室，與外界隔絕，看不到外面，聽不到聲響，無法得到訊息，無法得知時間流逝。你們，唯一獲得自由的機會，是這個：你們會被關進這些囚室，然後，每日會隨機只打開一間房，裡面的囚犯會獨自走到中央房間處放風。那裡有一盞燈，以及一個開關。燈的電力供應充足，壞了會立即有人去修理，也不會改變燈的開關狀態。即是說，只有每次出來放風的囚犯可以控制燈的開或關。而囚犯留下的任何痕跡，包括記號、文字都會被消除。

「而你們的自由條件，就是要達成這個目標：某日只要有人來給我證明，你們100人都去過中央房間，你們全體被釋放，否則全部砍頭。現在有15分鐘時間，給你們商量對策，爾後，就會全部被隔離囚禁，直至你們找到方法獲釋或死。」於是，100個囚犯就圍攏在一起，在限時內密謀辦法。首先，莽夫甚麼都不想，就說：「不理了，我們齊齊跟國王拚了算！」學者立即阻止，說：「這樣沒用的，寧為玉碎不是好方法，蛇無頭只會更慘。」商人說：「對，一個國王倒下，還會有另一個國王頂上，這不實際。」祭司插話：「時間正溜走，大家快想辦法！」學者：「這樣如何？國王說不能留痕跡，但我們可



以拿走燈泡！誰拿夠99個，就成了！」商人：「但你怎知其他人都出去了99次？你忘了這是隨機開門嗎？」祭司：「每個人都分配一個號碼如何？單數的開燈，雙數的就關燈……」學者：「這無補於事呀！」律師：「這樣吧，約100天後，我們要求所有人去中央房間才證實到，不就好了？」學者：「你這樣走法律罅是沒用的，而且，你怎確認日子？」莽夫：「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還是推翻國王吧……」莽夫因低智發言立即被飽以老拳。

你想到對策嗎？不打緊，總會有人出來解話。一直沉默不語的智者走出來，說：「這樣吧，燈本來就是熄掉的，所以第一個人出去放風的，就把燈亮了，同時成為數算者。其他人出去放風見到燈亮了，不用管。直至第二次出去放風，就把燈關掉，以後再放風也不用理會燈的狀況，即是說，除了數算者，其他人只會關一次燈。而數算者見到燈關掉，就開了它；同時記下次數。只要他數算到九十九次，即是所有人都到過中央房間了。」語未畢，囚犯已歡呼，直要把聰明過人的智者當神崇拜！15分鐘剛好過去，於是大家就抱持住「只關一次燈」的信念活下去，而剛好智者被隨機分派為第一個出去放風的人，他自然擔當數算者的使命，準備有天讓囚犯獲得自由。他覺得苦等下去，一定會有結果。

這就是解謎的正確答案，單靠開燈關燈就可以拿得到證據，證實他們都出過去放風。有數學家開始計算這個或然率：好運的話，他們第100日就全部100人出過去一次，200日後智者就會知道100人都出過去，但不好運呢？最少要多少時間才完成？把隨機出現的可能點清，計起來，要約10,417日，即是差不多29年，也未必真的實現。到智者真的數算清了，他們已被騙去了30個寒暑。

我們離慈善境界有多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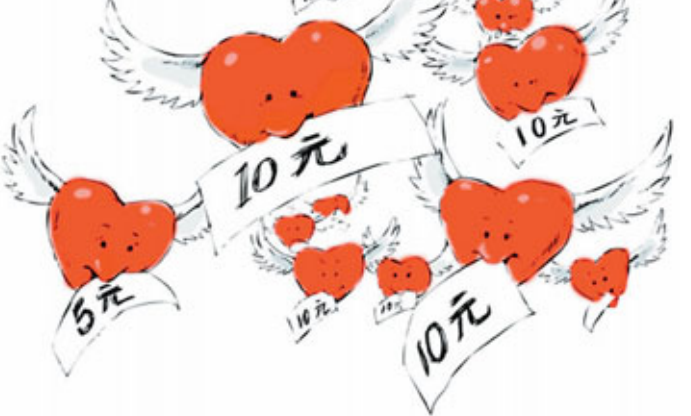
■文：王曉華

隨着經濟水平的提高，國人投身公益事業的能力和熱情與日俱增，慈善家的故事越來越多地流傳於傳媒和坊間。投身慈善意味着愛和給予，自然是功德無量的大好事。不過，有些人做慈善者將捐贈當作炫富的機會，常常居高臨下地對待受助者，言語間透露出強烈的等級意識，其行為往往引起爭議和質疑。於是，部分愛思考的人開始追問：我們離真正的慈善精神還有多遠？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行不暢。要敞開慈善精神的內涵，正名的功夫必不可少。慈善這個詞雖非舶來語，但它的現代內涵與傳統意義差別很大。《說文解字》對慈的解釋為：「慈，愛也。從心，茲聲。」從表面上看，這的確就是慈善一詞的本意：慈善在英文中通常寫作Charity，意為博愛。不過，愛是個總稱，而愛的方式卻有可能大不相同。在中國主流傳統文化中，「上愛下曰慈」，相應的慈善理念蘊含着明晰的等級意識。部分國人習慣於以「上愛下」的方式行善，恐怕就是受這種傳統觀念的影響。

然而，「上愛下曰慈」的理念屬於傳統語境，與現代慈善精神相悖：現代語境中的慈善精神以博愛為本，而博愛屬於三大現代理念（自由、平等、博愛）之一，因此，博愛本來就意味着平等待人，尊重他人的自由。在總結這種意義上的博愛精神時，法國哲學家保羅·蒂博（Paul Thibaud）說：「我們有多麼視自由和平等為權利，也多麼有義務以博愛去尊重他人。故此，這是道德的格言。」受這種理念支配，西方著名的現代慈善家都視他人的自由和平等為權利。他們的愛幾乎總是超越等級的藩籬，惠及各個階層、種族、性別的眾生。十九世紀著名的英國慈善家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堅信人人「生而平等」，為廢除奴隸運動殫精竭慮，於去世前促成英國通過相應法案。與他大體上同時代的慈善家沙夫茨伯里伯爵（Lord Shaftesbury）則是廢除童工運動的發起者。他們眼裡的奴隸、童工、流浪漢都是享有自由和平等權利的人，理應獲得關懷。在他們的影響下，以平等之心關愛他人成為現代慈善者的共同立場。現代慈善事業的參與者已非傳統意義上的施捨者，他們與受助者是平等的合作關係。為了讓受助者安心，以中性詞命

■國人投身公益事業的能力和熱情與日俱增。網上圖片



名慈善機構已經成為西方的慣例和傳統。以這種現代理念為尺度，我們就會發現某些國人離真正的慈善精神有多遠。許多人將捐贈本身當作慈善的全部，常常不顧及受助者的感受。他們往往攜帶大量現金，邀請媒體到場，有意識地將自己的強勢地位呈現給公眾。至少在其潛意識裡，這些捐贈者沒有把自己與受助者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在某種意義上，展示、強調、享受這種不平等關係是部分人捐贈的深層動機。此類施捨式的捐贈雖然會客觀上幫助別人，但與現代慈善理念相悖。這樣的捐贈再多，也難以造就真正的慈善家。

慈善是一種精神、一種境界、一種立場。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接近現代慈善理念的是墨家「愛無差等」的兼愛思想。可惜的是，這種精神譜系在傳統文化中僅是支流，對當代中國人的影響更是微乎其微。經過20世紀複雜的因緣際會，平等精神仍未在當代中國深入人心，許多國人（包括知識分子、名人、富豪）依舊是等級制的信徒。這注定了國人還難以立刻理解慈善理念和平等精神的內在聯繫。從根本上說，我們離平等精神有多遠，離慈善境界就有多遠。沒有平等精神，一個人就至多是捐贈者而非慈善家。中國越來越不缺捐贈者，但真正的慈善家卻不多。這無疑是個缺憾。要彌補這種進步中的不足，國人還要經歷精神上的蛻變。(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